

总 论

武陵地区民族教育的历史已很久远，但对武陵地区民族教育的研究还是近些年的事，特别是把武陵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对该地区的民族教育发展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更是很少。然而，尽管这一地区由分辖在四个省市的 37 个县市组成，它们却在地理、生态、文化、民族、经济生活方式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民族构成方面都以土家族、苗族、汉族为主体，30 余个民族混杂而居，长时期共存并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格局。特别是，国务院扶贫办把武陵地区作为全国 18 个连片贫困区之一进行扶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更加显现了系统研究这块大地上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问题是很有意义的。鉴于此，2001 年我们以“西部大开发背景下武陵地区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为题，申报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并被批准为教育部重点课题，本书就是该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武陵地区范围的界定有多种，但以武陵山脉为主线是共同的。我们根据这个主线和民族主体构成情况以及调研时，当地人们认可的观点，确定今天我们研究的武陵地区包括现在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的吉首市、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县、张家界市所辖各区县：永定区、武陵源区、慈利县、桑植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的 8 县市：恩施市、利川市、建始县、巴东县、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鹤峰县；宜昌市所辖两个土族自治县：长阳土族自治县、五峰土族自治县；重庆市所辖 4 个区县：黔江区、石柱土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族自治县；贵州省铜仁地区所辖 10 个市辖区：铜仁市、江口县、玉屏县、石阡县、思南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德江县、沿河土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万山特区。国土面积近 10 万平方公里。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该

地区总人口 14276524 人 其中土家族 6712031 人 汉族 4818986 人 ,苗族 2015808 人 ,其他少数民族共计 729699 人。少数民族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 66.25% ,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 ,并有着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生活、民族问题与教育等特征。

一、“武陵”之源

“武陵”一词是一个源于自然发展延绵于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地域性概念。《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解释“武陵山”时指出 武陵山有三处 :一在江西余干县界 即左之武林 ;一在湖北荆门县西水四十里 三即是武陵郡所在的武陵山 所谓“武陵山”为“自贵州苗岭分支 行乌、沅二江间 蔓延于湖南省西山沅澧二江间 高度达六千余尺 至常德西境之平山止 通称武陵山脉 为左昔五溪蛮地 开化甚迟。平山一名武山 ,一名太和山 又名武陵山 其自贵州北出者 经川湘间入湖北 分为二支。南支绵延来凤、咸丰、鹤峰诸县境 北支横亘利川、建始诸县境 亦曰施山山脉 郁积磐亘 山高谷深 至为险阻。利川之齐岳山尤为高峻 夏日积雪不融。”《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中解释为:“武陵山在湖南西北部及湖北、贵州两省边境 东北西南走向 乌江和沅江 澧水分水岭 海拔 1000 米左右 主峰梵净山 (2494 米 在贵州江口县北 富林矿资源。”从现在中国地形图上看 ,这个解释是合理的。武陵山发脉于贵州东北部印江、江口、松桃三县交界的梵净山 ,从西南向东北行 ,穿过川东南 ,主脉成为湘鄂界山。武陵山脉北行过清江、长江 到长江北为荆山 南支经湘西北余脉延至洞庭西。由此可见 ,“武陵”一词源于武陵山脉 是一个地理概念。另一方面 ,“武陵”又是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区划概念。《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释:“汉置 治义陵 在今湖南溆浦县南三里 后汉移至临沅 在今湖南常德县西。隋初废 寻复置 移今都德县治。唐置朗州 ,寻仍曰武陵郡 ,后又为朗州。宋曰朗州武陵郡 ,寻废。”《辞海》释:“郡名 汉高帝置。治所在义陵(今湖南溆浦南) ,辖境相当今湖北长阳、五峰、鹤峰、来凤等县 湖南沅江流域以西 贵州东部及

广西三江、龙胜等地。东汉移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西）。其后辖境逐渐缩小。隋开皇九年（589）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朗州为武陵郡。境内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被称为“武陵蛮”。具《汉书·地理志》载：“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属荆州，户三万四千一百七十七，口十八万五千七百八十五，县十二。”所辖县包括索（今湖南汉寿）、孱陵（今湖北公安）、临沅（今常德桃源）、沅陵（湖南沅陵）、潭成（今保靖南）、无阳（今芷江）、迁陵（今保靖）、酉阳（今永顺保靖一带）、义陵（今溆浦）、艮山（今宜昌、长阳一带）、零阳（今慈利、石门一带）、沅（今桑植）。而《后汉书·郡国志》也记载更加清楚：“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南阳二千一百里，十二城，户四万六千六百七十二，口二十五万九百一十三。”设有临沅（今湖南常德）、汉寿（今湖南常德东北）、孱陵（今湖北公安）、零阳（今湖南慈利）、沅（今湖南桑植）、沅陵（今湖南沅陵西南）、辰阳（今湖南辰溪西）、酉阳（今湖南永顺东南）、迁陵（今湖南保靖东）、潭成（今湖南保靖南）、沅南（今湖南桃源）、作唐（今湖南安乡）。除“索”“无阳”“义陵”“沂山”变为“汉寿”“辰阳”“沅浦”“作唐”外，其他八县名称未变。综上权威词典和典籍之记载，我们不难看出，“武陵”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域性概念，其源流至少可以追溯到汉高帝设置的武陵郡，至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历史行政区划如何变化，“武陵”指今天的湘、鄂、渝、黔接壤的边区地州、县市形成的以武陵山脉为中心，以土家族、苗族为主要世居少数民族并融土家、苗、汉、侗等 30 多个民族为一体的民族地区。

二、武陵地区自然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水土资源、动植物及矿藏资源丰富，是适合人类居住、生活的美好家园

武陵地区地处全国中心地带，其北部是河南、陕西、内蒙古自治区，南部是湖南、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东部是鄂东、湘东、安徽、江西、福建、浙江，西部是四川、甘肃、西藏自治区。它距中国东西南北距离基本相等。这一地区江河纵横，大小河流数千条，著名的有清

江、溇水河、隔岩河、酉水河、武水河、乌江等河流。这些河流流向不一，它们纵横环绕着武陵地区，而最后都注入长江归入大海。丰富的水资源和清澈柔媚的水系，不仅增添了青山的秀色，而且也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提供了生活、交通的便利，同时还成为了身居深山的人民与外界文化交流的天然通道。据清代同治年间的《来凤县志·风俗志》卷二十八记载：“邑之卯洞，可通舟楫，直达江湖。县境与邻邑所产桐油、靛聚集于此。以及江右楚南贸易者麇至，往往以桐油诸物顺流而下，以棉花诸物逆水而来。”正是这种舟楫之便，使武陵地区的民族文化得以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交流融汇，汲取其精华，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武陵地区处在我国云贵高原的东部延伸地带。平均海拔高度在1000米左右，海拔在800米以上的地方占全境约70%。境内峰岭重叠，武陵山贯穿湖南的古丈、保靖、永顺、大庸、张家界和贵州的铜仁的印江等地，其支脉延伸到湖北的来凤、咸丰、宣恩、恩施、鹤峰和重庆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地。武陵山的主峰、梵净山高2494米，是乌江、清江、酉水河分水岭。而巫山山脉穿插于恩施、建始、巴东。大娄山在渝东黔江地区展开，湖北和利川齐跃山为其边缘山脉。

武陵地区大致属于亚热带气候，温和湿润，季节分明。但因其地貌诸因素的影响，气温、降雨量、日照等变化差异很大。有民谚云：“山高一丈，大不一样。”尤其是夏季，山间气候变化更大，山岭上细雨濛濛，山腰则风和日丽，山麓却酷暑如蒸了。

一般而言，春季平均气温15℃左右，夏季平均30℃左右，秋季平均25℃左右，冬季平均4℃左右。全年无霜期在150~290天之间，年降雨量平均在1200~1000毫米之间，然而春季多雨，夏季多旱。山地雾重，日照较少，温度大，低山地区风小，这些对山区作物的生长极为有利。

武陵地区植被丰富，动植物种类多，数量大。《汉书·地理志》记：“巴蜀汉广，有山林竹木之饶。”土司时期，武陵地区生长着大量的楠木、白楠等珍奇树种。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改土归流后，尽管这一地区垦殖空前，甚至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建设，该地区仍然

有众多的动植物。据有关部门的调查，今恩施州有林面积 1090.7 万亩，活立木蓄量为 1835.7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 39.39%，这些植被均高于湖北省及全国同境植被。武陵地区林种丰富，如恩施州有树 171 科、60 属、1264 种，其中经济价值较大的林松杉树、楠木、泡桐、油桐、油茶等 300 多种，珍稀树种有银杏、水杉、珙桐等 60 多种。

武陵地区盛产药材，中药材资源丰富，有“华中药库”之称。如恩施州有药用植物 168 科、854 属、2088 种，占全国已发现药材的 46%，其中已收购品种为 282 个，占全国已收购品种的 40%。大面积植物的有鸡爪黄连、板桥党参、紫油厚朴、当归、杜仲等多种，其中黄连、贝母收购量居全国第二，厚朴产量占全国的

武陵地区野生动物繁多，并且分布广，经济价值高。其中仅恩施州被列为国家保护的珍贵动物有 23 种，占湖北省的 64%。野生毛皮类动物 60 多种，药用动物 60 多种。

武陵地区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清江融河岩电站、正建的水布垭电站、张家界旅游区、凤凰城、梵净山、芙蓉镇。恩施州境内“天下第一漂”清江 80 里闯滩漂流；“天下第一寨”鱼木寨（土家族山寨）；“天下第一杉”利川一棵水杉经考证为世界水杉之祖；“天下第一洞”利川腾龙洞，还有“天下第一井”利川大水井，是指大地主李家庄园。这个庄园远在四川刘文彩庄园之上，其水井更是一道非凡的景观等等。特别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宜万铁路（经过恩施）、沪蓉高速公路等交通干线的全线动工，2008 年后，这一地区将成为第一流的生态旅游区。

三、武陵地区以土家、苗族为主要世居民族，土家、苗、汉等多民族相融而居，共同发展。

武陵地区聚居着土家、苗、侗、瑶、布依、白等 12 多个少数民族。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该地区总人口 14276524 人，其中少数民族 9457538 人，占总人口的 66.25%，人口最多的是土家族。这个地区有土家族 6712031 人，占这一区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71%，占全国土家族总人口的 83.7%（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有土家族人口 802

万人)。因此,许多学者也把这一地区叫做土家族地区,当然,叫做土家族地区的根本原因,不单是人口的多少,更是由土家族的形成历史所确定的。关于土家族族源问题研究有多种观点,主要有巴人说、氏羌说、土著先民说、江西迁来说、乌蛮说、濮人说、蛮蜒说、东夷说、毕方和兹方说、夔人说、多元说等。综合各类学者的论述,以及人们对民族共同体认可的基本特征分析,联系我们田野调查过程中当地人们自我认同的观点,笔者赞同土家族的“两个源头说”。即古代巴人是土家族的主要源头之一,而湘西土著或濮人是土家族的另一个主要源头。是这两个源头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通过融合其他一些外来民族的部分成员在唐末形成的一个较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土家族。因此,武陵地区是土家族孕育、成长、发展的地方。土家族是武陵地区的世居民族,也是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

武陵地区还有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世居少数民族——苗族,它是中国历史上颇具影响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族源可上溯到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南蛮”。学者们研究认为,黄帝时的九黎(尧、舜、禹时的三苗乃九黎的后裔,商、周时的南蛮则又是三苗的后裔。这三个古老的民族部落集团是苗族最早的祖先。而九黎之君蚩尤和三苗之首领驩兜是苗族的两位始祖。然而,真正的苗族形成是三苗部落联盟被尧、舜、禹击败之后,再次被迫大规模徙往西北和荆襄一带,即所谓“窜三苗于三危(今甘肃敦煌一带)放驩兜于崇山(今湖南大庸即张家界一带)”。史籍中“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以及“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的记载,不仅反映了这一历史变迁而且也明确指出了苗族先民“南蛮”与“三苗”之间的宗缘关系。商周时期,三苗的主要部分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其他民族杂处,被称为“荆楚”即“南蛮”,后来荆楚(南蛮)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发展,其中较先进的楚人又被专称为“荆蛮”。“荆楚”(南蛮)是从三苗中的一部发展起来的。春秋时,以“南蛮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缕”(《公羊传》),表达了对部分南蛮的发展所产生的忧虑之情。到春秋初年,楚人与南蛮有了明显区别,楚人已经发展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的主体居民。南蛮中除分化出去的一部分

形成楚族外（后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聚居在楚国的西部边境。初期仍与楚国不断发生纠纷，后来服属于楚国，成为楚国统治下的少数民族，这一部分南蛮就是秦朝时期黔中郡的“黔中蛮”，汉时武陵郡的武陵蛮（五溪蛮）。学术界认为武陵蛮是苗族的先民。唐宋以后，由于苗族不断显示其影响，引起封建王朝的注意，各代中央王朝与苗族的接触日益频繁，对苗族的认识逐步加深，于是“苗”遂从若干少数民族混杂的“蛮”中脱离出来，作为单一民族的族被重视。于文献中，如唐代樊绰《蛮书》卷十中便有“黔、涪、巴、夏，四邑苗众”的记载。宋代朱辅《溪蛮丛笑》中明确指出“五溪之蛮……今有五心，曰苗、曰徭、曰僚、曰仡佬、曰仡佬。”元明清时期又将与苗族杂居的其它少数民族已称为“苗”等等，这些都说明，苗族是武陵地区的世居民族。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这一地区有苗族2015808人，占这一地区总人口14%。成为这一地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其他民族是各个历史时期在各种情况下进入到武陵地区而与土家族、苗族共同生活的。比如汉族，羁縻时期有土家族首领招募汉族地区的流民，从汉民地区掠夺来的汉人，宋政府驻守土家族地区的汉族士兵。土司时期，明政府卫所士兵，元末明初与明末清初因战乱迁入土家族地区的外来人口，失去土地的汉流民和被土司招进佣耕的汉族人口，汉族商人进入土家族地区等。改土归流后，清政府中止了土司时期的“汉不入境，蛮不出洞”的禁令。这使得汉族地区流民大量进入土家族地区。民国时期有了进一步好转，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更加促使了土家族与汉族的交流与融合并得到很大发展。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汉族4818986人，占这一地区人口的34%。土家族与其他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到今天武陵地区已成为以土家族、苗族为世居主体民族与汉族及其他的30余个民族互相促进，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繁荣的民族大家庭。

四、武陵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形成了以土家族、苗族文化为主体的民族文化，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地域性文化

文化是人们创造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 它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大部分组成。前面已经论及，土家族、苗族是武陵地区主要的世居民族，它们不仅世居于这一地区繁衍和发展，而且其人口为 8727839 人(土家、苗)占这一地区总人口的 61.2%。因此，土家族、苗族文化表现了武陵地区文化的主体特征，尽管汉族文化以高势能文化的能量进入武陵地区并对这一地区文化有较大影响，但仍不失武陵地区作为民族地区具有的文化个性。

1. 土家族文化特征

土家族物态文化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生产、生活、器具的竹木化及其形状的特殊性。这与武陵地区自然植物资源和生活习俗有关；二是以吊脚楼为代表的建筑文化，这与武陵地区动植物状况生态环境有关系；三是以西兰卡普为代表的纺织及其制品文化。这反映了土家人聪明智慧和爱美的心里特征，而这些特征又与当地自然生态紧密相联。如西兰卡普俗称土花铺盖，用麻织成，上面织有多种图案。其图案有三类：一类是取材于自然的图案，如虎豹斑纹、锦鸡彩羽、蟒蛇赤章等，这些都是武陵地区人们崇拜的动物类；另一类是取材于物体几何图形 如墙边花、方形叠坡图案、弧形图案、水波纹图案等及其组合图案，都是当地自然界形成的印象美图案，还有的是以青定蓝、黑、青为基调色彩 配以多种彩色 形成五彩缤纷的姿态 各种图案配以多样颜色使其极富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土家族的制度文化主要表现在经济制度上。因为武陵地区是南方山区，这种自然环境使土家族经济成为一种复合式经济，这种复合式经济主要为采集经济、渔猎经济、农耕经济等三部分组成，从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武陵地区特色的土家族经济制度文化：采集文化、渔猎文化和农耕文化。采集文化源于采集生产，因植物为人们提供可食可用之物。所以采集生产主要是以天然的植物为生产对象。在采集时代树木是提供人们物质生活的重要源泉。因此，在长期采集生产过程中土家族对树木产生自然崇拜，其主要表现

在对果树、古树和花树的树神崇拜。对此，史料中有许多记载。如宋代《太平广记》中记载了唐代开元年间，有关树神的故事，和崇拜花树的故事；民国时期的《永顺县志》记载了土家人崇拜古树的故事，《泸溪县志》记载了土家人祭拜楠木神树的故事等等。渔猎文化是源于武陵地区渔猎经济生活，主要表现在猎神崇拜，山神崇拜，赶仗和放闹等方面，这些都在《酉阳州志》、《容美纪游》、《鹤峰州志》、《长乐县志》中有记载。农耕文化源于农耕经济，唐宋以后，农耕经济在武陵地区得到很大发展。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农耕经济占绝对地位。而这里的农耕经济是以旱粮作物种植为主的农耕经济，因而，在长期农耕经济生活中，土家人产生了具有武陵地区农耕经济特点的丰富的农耕文化。主要表现在太阳神崇拜、雨神崇拜、土地神崇拜、牛崇拜、毛娘崇拜、社巴神崇拜、谷神崇拜 农耕歌谣、农耕谚语、农耕风俗、饮食文化，农耕文化心理等方面。其内容十分广泛并极具民族地方特色。

土家族的精神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图案学科（如白虎崇拜等）二是信巫鬼、重人祠；三是有特色的土家歌舞、体育文化 如跳丧歌舞（撒尔嗬）、哭嫁歌舞、摆手舞、各种情歌（如龙船调），以及口传文化和习俗文化等等。对此，学者论及颇多，如段超教授的《土家文化史》等 此不详述。

2. 武陵地区苗族文化特征

苗族的物态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竹器和铁器为主的山地耕作工具和生活器具及其形状形成的文化，如其中最具有苗族特色的是竹器中的背篓、挑篓。其他与土家族、汉族的同类工具大同小异 它们都与地方自然资源、地理特征、生态资源分不开 二是以典型干栏式吊脚楼为代表的建筑文化。苗族的吊脚楼保持着自己的本质特征，同时又吸收了土家族吊脚楼的建筑风格；三是独具特色的服饰文化。苗族服饰、装饰却很耀眼，在保持总体风格情况下，又因地域的不同，而在颜色或格调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从而使得苗族服装五彩缤纷，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特性。武陵地区苗族的制度文化与土家族的制度文化体现在经济制度上是基本相同的，因为经

济制度与地方、地理、生态环境直接相关。武陵地区苗族的精神文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习俗文化。最典型是婚姻习俗、丧葬习俗和节日习俗。这些习俗也因地方不同而有异，即有地域文化特色；二是图腾崇拜，武陵地区苗族主要有两个图腾崇拜，即盘瓠图腾崇拜和牛图腾崇拜。伍新福在《苗族历史探考》中指出。“湘西、黔东北以及渝、鄂之界地区的苗族先民以神犬，环盘瓠为自己的图腾。”这个结论已被我国古代汉文典籍的记载所证实。如《后汉书·南蛮传》就论述了武陵地区苗族信奉犬图腾的事实。而苗族的“牛王节”则是武陵地区苗族的牛图腾崇拜的最好证明；三是苗族的器乐、歌舞、歌谣文化。武陵地区苗族乐器最具自己特色的是铜铃、竹鼓和长筒铜号等。其他也有一些与当地土家族、汉族相同的乐器如鼓、锣、钹等。武陵地区苗族的舞蹈形式多样，有彩鼓舞、猴儿鼓、单人或双人鼓舞、茶盘舞、打花鼓、地狮子、板凳龙、花花灯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然而，各种舞蹈因地域不同而在表演中有较大差异。歌谣是武陵地区艺术文化表现的另一种形式，特别是以山歌为主体的苗歌更是体现了该地区苗族的特有个性。

3. 其他文化的影响

在前面简述土家族、苗族族源和武陵地区民族构成时 我们已经看到，武陵地区以土家族、苗族为主体世居民族与其他 30 余个民族长期混杂而居 生活在一起 其发展、交往必然产生文化的相互影响。因此，虽然土家族、苗族的文化特征表现了武陵文化的主体特征，但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楚文化对武陵地区文化有重要影响。春秋战国时期，武陵地区是楚巴两国的交接地带。尽管巴人在武陵地区势力较大。但，仍有楚人进入这一地区，并逐渐形成该地区土家族、苗族诸部族中也有楚人的进入。因此，楚文化对武陵文化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首先是成为土家族、苗族中楚人的文化因为直接遗传给土家族、苗族，进而融入武陵文化；其次是楚文化与巴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巴文化中也有楚文化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通过巴文化继承给土家族文化，从而融入武陵文化。

二是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今武陵地区是土家族世居地域，同时，从古至今，这一地区也都有苗族生活。在较早时候苗族先民“盘瓠蛮”及其后裔在此活动，随着历史的发展，原本不在这一地区生活的苗族也迁入了武陵地区。这样使得这些世居于此和后来进来的苗族与世居的土家族共同生活在同一区域，同一个文化区内两个民族共处，彼此间必然会产生文化交流。土家族与苗族的共处其文化相互认同在认同过程中双方文化产生相互吸收形成新的有各自特色的文化，从而进一步丰富了武陵文化。

三是汉文化的影响。武陵地区早有汉人生活，汉族虽不是武陵地区的世居或土著民族，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汉族进入这一地区的人口越来越多，特别是改土归流后，汉族人口大规模进入武陵地区。这些汉族人口进入武陵地区定居，与土家族人、苗族人长期的朝夕相处，彼此文化逐渐认同。从而武陵文化融入了汉文化的因素。更主要的是，土家族、苗族有语言而无本民族的文字，他们只能用口传形式保留和继承着本民族的文化。因此当汉族语言文化进入武陵地区时，土家族特别是历代中央王朝办教育，施以儒学文化的训教和记录着这一地区民族文化的历史及发展事件，这些都直接输入了汉文化的因素，到现在可以说武陵地区使用本民族——土家语、苗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人越来越少，一些具有民族语言文化的痕迹越来越少，好在居住在武陵地区的一批热心于这一地区民族语言文化的抢救和保护的专家学者（以湖北民族学院和吉首大学的教授们为主力军）在政府的支持下，正在努力工作，定能使这一地区的民族语言文化的优秀部分给以发扬光大。

四是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武陵地区除土家族、苗族、汉族外，还生活着侗族、瑶族、彝族等30余个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有的是早先就居住在武陵地区，有的则是后来从其他地方迁来的（如侗族）。但武陵地区从春秋时期开始就是多民族杂居地区，这种文化生态对武陵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它使得这一地区中的土家族、苗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吸收汉、瑶、侗等民族的文化，形成武陵地区以土家族、苗族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多民族

文化构成的多元文化。土家、苗族、汉族等共同生活在同一区域，由于长期共处 特别是彼此通婚 而造成语言相通 风俗相同 彼此文化间有共通之处 也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以至于到今天 对于土家、苗族、侗族等共有的风习和有关文化现象很难区分为谁是谁的。

五、武陵地区民族教育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武陵地区是一个具有地方民族、历史、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民族教育形式和体系，为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武陵地区的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民族口承教育。由于生活在武陵地区的主要世居民族——土家族、苗族只有本民族的语言 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以本民族语言为工具的口承教育形式是最直接最能表达本地本民族文化特点的教育形式。这里口承教育主要有四种：家庭口承教育、家族口承教育、村寨社区歌舞喜庆祭事口承教育和师徒口承教育等。其教育的主要内容有：生活常识教育、生产技能教育、人生礼仪和节日礼仪教育、民间文化与习俗教育等。这种教育形式是在文字传承和学校教育形成之前的唯一教育途径。同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形式一直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现在因为武陵地区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都使用汉语（据知，现在全国土家族仍在使用土家语的已不足 10 万人了），因此，现在的口承教育主要是以汉语言为工具进行传授的。二是汉文字人文作品教育，即用汉字记述、表述的文化、文学、精神、习俗等方面的著作、诗词、歌曲、民谣等人文作品传承的教育。由于武陵地区的主要世居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而关于该地区流传的文字记载事件和人文作品都是汉文字，这种文字传承教育受汉文化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以表述汉文化和记载汉族事件的作品进入武陵地区进行传播教育的影响；另一种是用汉文字记载的这一地区的各类事件和汉文字撰写的具有这一地区民族特色的人文作品进行传播教育的影响。当然，在影响的同时，更多地是促进了该地区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然而，无论是口承教育还是汉字人文作品教育，它们都是武陵地区整个民族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们还不是促进该地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部分。作为一种以目标教育为核心的教育体系的主体应该是学校教育。为此，我们重点概述一下武陵地区学校教育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武陵地区的学校教育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汉文化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形式多样的古代学校教育阶段。

武陵地区的学校教育有明确记载的是始于东汉，东汉光武帝年间（25～55）宋均在治理“五溪蛮夷”时“见其俗少学者，信巫鬼”，随即“为立学校”。东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4）应奉任武陵郡太守，也在郡治所在地“兴学校，举侧陋”。这些记载表明东汉时期就开始有了学校教育。然而，由于武陵地区是川鄂要道，一直是军事战略要地，各政治势力均视之为必争之地，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里是蜀与吴、吴与晋的战乱纷争之地，这种战乱使得学校教育受到很大冲击。直到唐宋时期才有了新的发展，统治阶级在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上采取了“教是以礼仪”政策，开始启用武陵地区的受到较好程度教育的少数民族成员担任地方官吏，这一时期武陵地区学校教育日兴不辍，在乡村已有了私塾。如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武陵地区开始建立学宫；宋代绍兴年间（1131～1162）位于今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城东五十里的大漆乡内创建了武陵地区第一个书院——鸾塘书院。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武陵地区还在之辰州府泸溪郡（今湘西泸溪县）设有“东州书院”。宋淳佑十二年（1252）印江县山寨始开私塾等等。然而，真正形成武陵地区的古代学校教育格局是元明清时期。武陵地区古代学校教育的基本格局是由书院、义学、社学、族学、私塾、官学等形式构成的，其中书院是这一地区发展最早影响极大的学校机构。宋代书院发起后，元朝大德八年（1304）大庸永顺建立了天门山麓书院，其后正德、万历年间建有巴东“文昌书院”、永顺“若云书院”。随后到清朝，书院得到了较大发展，在今湖南的湘西州和张家界境内、贵州的铜仁、重庆的秀山、湖北的恩施州和五峰、长阳所辖地先后建立了近百所书院，如仅施南府在清

乾隆至光绪初年间就先后建有 20 多所书院。到清末，整个武陵地区已是书院林立。书院建立主要是有识之士创立，同时也得到府、县的认可和支持。书院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以儒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教育，为科举制度服务的。

义学和族学也是这一地区重要的古代学校教育机构。武陵地区族学始于义学。清雍正年间（1723 ~ 1735）武陵地区“改土归流”，设府置县，朝廷认为“应先设立义学，择本省贡生员，令其实心教诲，量予廪饩”。从此，武陵地区较为广泛的设立义学。据统计，从清雍正八年（1730）至宣统三年（1911），今恩施州境内共设义学 19 所；湘西州和张家界市境内设义学 12 所，宜昌的五峰自治县 4 所，铜仁的印江自治县 8 所。仅在 1755 ~ 1775 年的 20 年间，龙山、永顺、保靖、桑植、大庸县就创办义学 18 所。所谓族学，就是为某一民族开办（也有几个民族合办的）专收某族子弟入学，为名门望族课子的场所，多以氏族命名，本族子弟可免费入学，外族子弟不能享受同等待遇。武陵地区的第一所族学是大庸县留日学者屈髯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屈家坊创办的屈家坊自立义学，其后有大庸“刘氏自立义学”、“侯氏养云山自立义学”、“胡氏三岔村私立天南小学”等。仅大庸县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统计共计有 24 所族学。新中国成立前，武陵地区分布着数量不等的族学。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在新中国成立前的 200 多年祠堂绝大多数都办过学堂。因此，族学是清朝时期武陵地区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机构和教育形式。

中国的私塾始建于唐宋时期，武陵地区私塾始于宋代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印江县甲山寨，但多经波折，其主要发展是在清政府的“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之后。由于大量流官涌入武陵地区，一些乡绅富豪纷纷延聘外籍塾师，在城乡开馆设塾。雍正十一年（1733），龙山县富绅率先开设私塾。乾隆元年（1736）永顺的涂世法所开设的私塾影响较大，涂被誉为“开山先生”。明清到民国时期，整个武陵地区私塾林立，遍布城乡，成为武陵地区初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清初到民国年间，今恩施州、五峰县境内有私塾 2439 馆（所），29029 人。湘西的古丈、龙山、大庸、桑植、保

靖、贵州印江县，从民国元年（1912）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达 381 馆（所）。其中在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是甲山寨私塾，它从南宋淳佑十二年（1252）开办，延续到清宣统二年（1910）改为小学堂，计达 658 年。私塾按其程度有“蒙馆”、“经馆”之分。蒙馆收启蒙儿童，以读书识字为主。“经馆”收青少年，以读书、写字、作文为主。其性质分为村塾、族塾（团馆）、家塾（东馆）、坐塾（门馆）。入学年龄不限，修业年限不定，教学内容多由塾师自定，大多为“四书”、“五经”，也有教天文地理的。总之，当时的私塾形式宽泛，内容自由，易于建立和发展，适合于武陵地区的地理、人文和经济生活条件。这种形式的学校教育对促进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社学、官学和土司学校 这都是统治王朝为了加强统治和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官方学校。社学是元、明、清三代在乡村设立的教育机构，专收十五岁以下幼童，读《孝经》、《大学》、《论语》、《孟子》。武陵地区较早的社学是明朝嘉靖十年（1531）在印江县城太阳山麓建立的印江社学。后来还有朗溪社学等等，但明末停办。社学在武陵地区历史较短，没有能像书院、义学那样兴盛，而且最后被儒学（县学）所取代。官学是“改土归流”后武陵地区古代学校教育的主体形式。它们设置情况大致是府、州、县各设官学一所，如今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县市共设有府、县学九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的有永顺府学、永顺、保靖、龙山、桑植等县学。有的地方还根据行政建制设置厅学、所学和卫学。在私塾、义学等一类学校毕业，学有所成的学生称为童生。童生经过县、府、院等多级考试，合格者取得县学或府学资格，称生员。府县学生分三等，初入学称“附生”，经科考、岁考，成绩优良者可补为“廪生”，再经科、岁考试，成绩优秀，可升补为“贡生”；贡生“经过”“五贡途选”，授予府（县）学训导职务。武陵地区的官学，还有乾州厅学、永定卫学等。土司学校是另一类型的官学。元、明、清三代，封建中央王朝在武陵地区普遍设置土司，推行土司制度，加强对土司的文化控制，对土司子弟进行儒家文化教育。1395 年，朱元璋下诏：“诸土司皆立县学”，1501 年，明孝宗朱佑樞还诏令：“土司土官子弟，凡要承袭土职者，必须入学，不学者，

不得承袭。”于是先后相继在武陵地区建立土司学校。1399年巴东、长阳等县设立县学；1408年酉阳设立宣慰司学。万历年间保靖州在凤凰设立了土司司学，专门课教土司子弟；来凤卯洞也设司学等，一些没有司学的土司其土官及其子弟被送往附近州、县土司学校求学。土司学校所教内容多为儒家文化之经、史、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也教土司子弟练武，还设有演武场。

以上便是武陵地区古代学校教育的基本状况，这一地区的古代学校教育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汉文化和汉人进入武陵地区带来的先进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促进了该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二是历代封建王朝以统治为目标进行汉文化训教和儒学思想浸化，采取的一系列支持办学的政策和直接办官学等，促进了该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三是办学形式多样，并蕴涵着民族教育思想，体现了民族教育特色，如“义学、族学、土司学校”等有着浓厚的民族教育特点。同时在办学体制上形成了“民办”和“公办”两种体制，而且“民办”更显活跃，贡献更大。四是武陵地区以土家、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是开放性、开拓性、融合性很强的民族。五是办学层次不明，教学内容也基本上是单一的汉文化教育。因而也没有形成合理的学校教育体系。六是武陵地区古代学校教育基本上属于富人教育，即只有富人或上层家庭的人才能上学或才上得了学。

第二阶段，是以知识为主要教学内容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标的近代学校教育体系初步形成阶段。

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几千年封建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重视发展教育事业，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武陵地区民族教育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如印江县从1912年到1917年共有小学校31所，1915年古丈县办私立小学校50所，今恩施自治州境内，1926年还有私塾390多所，公立小学也很多。到1928年达到200多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教会小学。这一时期武陵地区进行了学校改制，将普遍存在的私塾、公立小学堂和教会小学校改为学校，还设立女子学校，并在教学内容上部分的吸取了西方先进的知识和思想，对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伦理观念

冲击很大。但因袁世凯窃国战乱四起，使得武陵地区秩序混乱，“学校独立，时废时停”，学校教育受到极大摧残。1929~1935年周逸群、贺龙等代表中共中央在湘、鄂、川（现在的渝）黔四省边区（就是我们指的武陵地区）建立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省军区，并在省革委会下成立了苏维埃教育部。各区、乡苏维埃政府还设有教育委员会，领导文化教育工作。省委还从有限的财政经费预算中拨出专项教育经费，相继开办了红军学校、军事短训班、苏维埃干部政治学校与训练班以及普通小学、列宁小学、苏区小学和工农群众教育。

在日本大肆侵略中国时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连连失败，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部分学校相继迁入西南山区，湘西、鄂西都有不少学校迁入。武陵地区教育出现“空前繁华”的局面。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长沙、武汉等沦陷区的各类学校和教育社团，部分的迁入了湘西、鄂西这两个抗战的大后方，一时间武陵地区的教育从幼教、中教到高教，形成了基本健全的教育体系。这些从沦陷区迁入武陵地区的大、中、小学校和教育社团，对封闭落后的武陵地区的文化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内迁的学校和教育社团聚集了大批的优秀教师、教授和教育专家，他们不仅在大学任教，还深入到各县所办的中小学任教，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和各民族优秀知识分子。抗战胜利后，内迁到武陵地区的学校和教育社团纷纷迁回原籍，一度繁荣的教育景象很快消失。但是，这一段时间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和繁荣景象，给这里的教育发展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为后来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时期武陵地区的教育有如下特点：一是在新的国体下，学校教育逐步呈现新的面貌。抗战时期，武陵地区教育“因祸得福”，内迁形成了武陵地区近代学校教育的体系，奠定了后来教育发展的基础。二是教学内容以知识为核心，吸取了西方先进文化知识和思想，促进了民众爱国热情的高涨。

第三阶段是以传播和创造科学文化知识为核心，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为教育教学内容，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目标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建立完善阶段。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中华人民